

《海神家族》： 三代台湾人的家书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魏如松

在去年法兰克福书展上,台湾女作家陈玉慧推出了其代表作《海神家族》德语版。日前,《海神家族(修订本)》一书由北京凤凰联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引进,与大陆读者见面。

陈玉慧,1957年生于台湾,在父辈缺席、母辈独守的家族中长大。18岁,她毅然出走留学于巴黎,曾在纽约、巴黎担任记者及编译,现任台湾《联合报》驻欧特派员,经常出入国际新闻现场。

这是一部书写三代台湾人60年漂泊和回归的家书。书中记录了一位出走异乡的台湾女子的寻根之旅,围绕外婆、母亲、阿姨和女儿三代台湾女人的命运,透过家族三个男人的经历,折射出了台湾百年沧桑。

作者以自己的家族史呈现出一段真实的“我们台湾这些年”。

作品以女性作为故事的起点,一层层揭露家族的秘密。外公林正男一心想



陈玉慧《我们台湾这些年》

《海神家族(修订本)》陈玉慧
江苏人民出版社
二〇一〇年五月

开飞机而抛家弃子,二叔公林秩男为政治献身而背井离乡,父亲二马被肉欲迷惑却不能对女性负责,这一切的一切使得男性缺席的家族出现了爱的缺席。

未婚夫早逝的外婆绫子,虽嫁给林正男却仍要饱受守寡之苦,静子母亲与心如阿姨彼此讨厌永不说活……女人之间嫌恨、伤害,却又不得不相互依赖,种种爱恨情仇穿插其中。走过日据、打过二战、庆祝光复……

三代人不堪回首的往事,一段纠结复杂的家族史,展现出台湾百年的时代动荡。

也许是因为作者当过记者,她的文字中带有客观理性的视角,但这些,并不影响这本书动人的哀愁。因为所有故事,都真实发生在陈玉慧一家三代人身上,任何创作都比不上曲折离奇的生活。

我几乎带着责难他们的态度,使他们也很难。之后我陷入严重的情绪低潮,我决定重新固定去做心理分析。

有一天,心理分析师在我面前摆了两把椅子,要我和父母对话,开始时有点困难,不过,当我开始跟椅子说起话后,小说人物就自己做开场白了。

这个家族的人来自不同的地方,在台湾住了下来,离家或成家,而这几乎便是台湾的故事。

海南周刊:所以,这本小说是你的自传体小说吗?

陈玉慧:《海神家族》是基于我对家族真实情感,一部分是真实的家族故事,另一部分则在这个情感基础上虚构出来,是一个混合式的自传体,个人与家的故事平行发展。

我年轻时急于离开家和台湾,我在小说中检视过去的断绝,且意识到自己与台湾势必无法分割。

我现在做的便是回到自己出发的地方,这些家族成员在台湾定居成家,他们虽多半意识到这里便是他们的家,但历史和命运却使他们身不由己。

以私历史为卷 公历史为轴

海南周刊:可否谈谈《海神家族》的主题,你是如何看待书中的父亲形象?

陈玉慧:书中7个女儿都没有父亲,父亲在那个台湾家族中缺席了,她们必须自己活下去。

在中国一些古典文学作品中,女儿经常被迫嫁给非爱的人,但女儿最多只与情人私奔。

我自己个人对父亲角色是爱恨交加,生长在父权思想浓厚的台湾社会,我的父亲刚好也是一个威权的父亲。我理想中的父亲形象是温和理性,懂得爱人,不会随便处罚儿女的人。这听起来似乎要求不多,但对我已是无法想象。他处罚我的方式令我想到他的遭遇,我确定那些遭遇因而转换成他内心的愤怒和渴望。

海南周刊:母亲形象呢?《海神家族》的女性角色似乎都不大能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?

陈玉慧:母亲让我忧郁,让我在小孩时没有机会当个孩子,从小被迫当成人。

我天性同情弱者,所以总是站在母亲那边,后来我知道我错了。如外婆和母亲,我绝对不要像她们那样地活,她们所生存的社会让她们别无选择,谢天谢地,我绝对不愿也不会像她们那样继续。

另一方面,我渴望母亲的爱,如同渴望回到大自然,因从来没有获得那样的情感,我的一生有了缺陷,也必然受苦。我不但在寻找父亲,终生也在寻找一个母亲。

海南周刊:《海神家族》以台湾历史事件为主轴,又与你“个人的历史”形成对照,你是怎么处理这之间关系的?

陈玉慧:个人的私历史如卷,而台湾公历史则为轴。当卷轴展开时,私历史的轮廓会更明晰,而公历史也因为私历史的关系被加强了其属性。

我尽求以客观的角度看待历史,我关心边缘人物,而非主流人物,持女性观点而非父权的观点。

我看台湾历史,觉得台湾其实与过去的台湾一样,台湾人因缺乏安全感而从未长远计划,也没办法长远规划,台湾人不习惯团结,台湾仍然跟自己的身份过不去,到现在还在内斗,是非常可惜的事情。

读书札记

胶片照相机的 爱好者

文\本刊特约撰稿 赵瑜

雷蒙德·卡佛是个酒鬼,所以,他的小说里,男人也多是酒鬼。

我相信一个酒鬼所看到的世界和平常的人所理解的世界,是不同的。醉酒之后的世界变得跳跃和不确定,说过的话已经忘记,爱过的人朦胧成糖块。最为浓烈的感情化成悲伤,最为快乐的时间缩短成一个梦境。

所以,当卡佛的文字引起全世界关注的时候,大家发现,有一个人所关注的世界和我们的日常生活不同,阅读卡佛,其实就是在片断化我们的日常生活,将日常生活的整体性打碎,我们一定会感觉惊讶。那么,卡佛便是这样的一个摄影师。

《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》是卡佛引起世界关注的第一部小说集,这本书在1981年便在美国出版,卡佛的小说句式以及结构方式,曾经成为一个华丽的技术流派,影响了一大批小说家的写作。但是,卡佛并没有被这些模仿者淹没,反而,他走得更远。

我喜欢卡佛在小说文本里的那种漫不经心的放松,他并没有把自己当作小说家,他一点也不打算让你在他的讲述中感动。他不是一个紧张的人,他只是一个普通不过的摄影师,看到他喜欢的生活截面,摁下快门,如此而已。

自然,卡佛并不是数码相机

爱好者,他的表达有所选择,而不是连续拍摄。他是一个古董的胶片照相机来拍摄生活。差不多,有一篇小说,可以表达卡佛写作的基本理念。那篇小说的名字叫做《取景框》。小说不介绍任何人物的背景,一个丢了双手却靠给别人家房子拍照片为生的人敲开了“我”的门。人物开始对话,那些话简直不痛不痒。但当“我”看到照片中若隐若现的自己时,才发现,原来照片所记录下来的场景,甚至是视角,对于“我”来说,是陌生的。所以,“我”有了很大的兴趣,

决定多拍一些照片。

这何尝不是卡佛进行“卡佛式”写作的一个动因,当他第一天醉酒后,将自己所怀疑或者喜欢的一些片断进行描述,第二天醒来,才发现,原来生活中的磁场有极大的变化,只是因为我们将置身于其中,没有旁观的能力。但是醉酒是一个好的契机,给了他写作的参照。

卡佛有一个较为底层的职业史,在他的个人简历中,他如数列出了他的工作,他骄傲于他的个人史:当过加油工人、清洁工、看门人、替人摘过郁金香。

这些工作让他有了别样的人生视角,所以,他的小说总会给我们提供新鲜的体验。

在《你们为什么不跳个舞》里,他没有介绍小说人物的任何背景,但是,看得出,那是一个被生活挤压的人,他已经破产了。

看到这篇小说,我们不得不想到作者本人,他也是因为酗酒而破产。然而,这个短篇里,他作为一个小说家,将一个繁杂而拥挤的生活从中间的某一个角度切开,给我们呈现了一个生活的片断。之前有什么样的情节,是空白,之后会有什么什么样的故事发生,卡佛才不去管。他这种大面积留白的做法,让评论家们欣喜若狂,认为,卡佛是故意设置小说阅读障碍,并将之命名为“极简主义”。

评论家们的修辞并没有错,其实,作为小说家的卡佛不可能在写作一个东西的时候想这么多,他不过是像《取景框》里的“我”一样,突然发现了生活中的另外一个角度。

他想用自己的笔将这样的风景固定下来,告诉别人,我们在大场景的生活中,极容易丢失自己,还是将自己隔离开这些宏大的生活场域,回到自己的片断里。

《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》这部作品集里呈现了一个社会的多个层面,读完以后,你会发现,你像进入一个社会纪实摄影的展览中。卡佛只用他的古老的胶片照相机截取了生活的一瞬,《洗澡》中住在医院的孩子变得如何了,不知道,因为照相机没有拍到。《告诉女人们我们出去一趟》中杀人后的杰瑞会不会被刑事处决,也是空白。因为卡佛的照相机只拍到这里,剩下的事情,留给时间来解决吧。

阅读卡佛时,我常常想,会不会,喝一些酒会更好。因为,酒水中所酝酿的情绪,更接近卡佛的本意。

《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》雷蒙德·卡佛 译林出版社 二〇一〇年一月



Q&A

写作必须面对真实的自己

海南周刊:你做过记者、导演、编剧,不停写作,是什么让你从未停止写作?

陈玉慧:我从小喜欢写。有些说不出的话,我比较喜欢写出来。写作能帮助我从心灵风暴抽离,能使我安静,我喜欢说故事,写作让我放心,感觉自己还活着。

海南周刊:写《海神家族》,是为了寻求更加真实自我的方式吗?

陈玉慧:应该是,但我并非刻意要去追求真实自我才去写,而是在写的过程中,自己逐渐必须面对真实的自己。

写《海神家族》的过程中在一定的程度上像心理治疗,一些心理分析的基础问题对我产生某些作用,如和父母相处的模式如何形成我自己和社会的关系。

我也看到家庭秘密对一个人心灵的潜在影响。更早之前,我与父母有许多问题,我以前想,他们不但不了解他们的孩子,也从来没爱过他们的孩子,在写作中,我能够意识到当时他们忙着维生及处理自我心理的冲突和矛盾,哪有时间爱孩子?

神奇的是,在写完《海神家族》后,我终于知道,感情和行为方式是可能遗传的,且连命运都可能遗传,我也彻底明白:我的父母可能真的没有爱过我,但有谁爱过他们?

这个认知使我完完全全接受他们,使我对人世少一点质疑,多一点宽容。

母语文化是根之所在

海南周刊:你觉得自己的根在哪里?

陈玉慧:我大半生都在国外,有时自己也很疑惑,我究竟是什么人?

我愈来愈觉得,我的根便是我的母语文化,而不是一个地方。

一个人不一定要住在异地才觉得失家,很可能活在自己的土地都像去了异乡。我从小用中文写作,写作也逐渐成为我的生活重心,或许这便是我的“根”。

海南周刊:写作《海神家族》,你遇到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?

陈玉慧:孤独,颈椎疼痛。但我没有抱怨,因为已经认清写作的目的。

我感受到作为台湾人民的苦痛,无父的悲哀,身份的怀疑,认同的渴望,历史命运的影响,我感受到自己的命运和台湾有多相像。你只能写,但你心里还有幻觉,你以为这世界还需要一本这样的小说,当幻象消失时,你实在写不下去。当然有时思绪阻塞,的确写不下去,只能等;勉力写,最后还是只能删除。

海南周刊:为什么要去写自己家族的故事?

陈玉慧:无家(或家)是我的人生课题之一。多年前我邀请父母到德国小住,却与他们难以相处,